

现在不是由个人主义做出发点、的所谓“独善其身”的时代了，要注意怎样做大众集团中一个前进的英勇的斗士，在集团的解放中才能获得个人的解放。^①

我十几年来所常以自勉的是要做个有益大众不为私图的新闻记者，我现在以及将来的志愿还是如此。我并且深信在民族解放的抗战与建国的大时代中，新闻记者有着他的重要的任务，我要终我之身守着这个岗位，和同志们望着光明的前途共同努力。^②

—— 韬奋

①《期望》，1935年11月23日《大众生活》第1卷第2期。

②《新闻记者活动的正确动机》，1938年4月1日汉口《新闻记者》月刊创刊号。

第一章

立于大众立场的经营方针

立于大众立场，服务大众，并以此为指针创建事业，扩展事业，是稻奋所创立的“生活”大业根基深厚，广受欢迎的根本保证。

稻奋坚守着大众立场，引领着“生活”不断在进步的路途上迈出新步伐，努力与民众的苦乐融为一体，着力提高劳苦大众的政治和文化素质，坚决维护民众利益，为抗战救国和民族解放奔走呼号，为推进民主政治、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殊死奋斗，忠贞不渝。

追求进步

邹韬奋，原名恩润，韬奋是他主编《生活》周刊以后所用的笔名。他生于 1895 年 9 月，原籍江西余江，生长于福州和上海。小时候在家里私塾读中国传统的启蒙读物。因为父亲希望他长大后做个工程师，韬奋在福州工业学校肄业后，父亲便送他进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的前身）附属小学读书。韬奋对算术、物理一类课程兴趣不大，最喜爱的科目是语文和历史，并在课外阅读了《古文词类纂》、《经史百家杂钞》、《韩昌黎全集》等书。受老师的影响，韬奋十分喜爱梁启超的著作和文章。并对当时《时报》上远生^①的《北京通讯》着了迷，向往做个像远生一样的新闻记者。韬奋后来回忆说：“有一点却在小学的最后一年就在心里决定了的，那就是自己宜于做一个新闻记者。在那个时候，我对于《时报》上的远生的《北京通讯》着了迷。每次到阅报室里去看报，先要注意《时报》上有没有登远生的特约通讯。”他所写的内容和所用的写的技术，都使当时的我佩服得很，非常羡慕他，希望自己将来也能做成那样一个新闻记者。”^②

韬奋在求学时代，是个苦学生，所有费用，全靠自己想办法。在转入贵族化的圣约翰后，除了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向朋友借用外，曾开始翻译杜威所著的《民本主义与教育》一书，想以此所得救急。但巨著

远生（1885—1915年）：即黄远庸，原名基。民国初年著名的新闻记者。江西九江人。曾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在北京编辑《少年中国》周报和《庸言》杂志，同时兼任上海《东方日报》、《时报》和《申报》的特约撰述。以撰写新闻通讯著称。1915年12月27日在美国旧金山遇刺身亡。

《新闻记者的作品》，1936年11月29日上海《生活星期刊》第1卷第26号。

的翻译，有远水救不了近火之苦，最后仍只得靠在私塾教课来挣些钱。每日下课后，就往外奔，教两小时课后再奔回来。后来韬奋做了该校图书馆夜间助理员，半工半读，才勉强捱过难关。

在圣约翰毕业后，韬奋本想进入新闻界，但因一时得不到什么机会，经毕云程的介绍，担任穆藕初所办的上海纱布交易所英文秘书。后来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人黄炎培请他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因为收入不够用，韬奋半天给职教社编辑《教育与职业》月刊和丛书，半天给科学名词审查会工作。有一段时间，韬奋还兼任中华职业学校教务主任和英文教员。这样的工作和生活状况持续了六年之久。

这一时期，职教社所发起的职业指导运动，使韬奋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这个运动的做法是在各中级学校举行职业指导运动周，让学生填写该社所特备的职业指导表，按月请专家演讲，最后由该社与学生作个别谈话。韬奋跑了好几个省的学校，在各处接洽进行这一运动。他对于职业指导，本来极感兴趣，很投入地研究，但他愈研究，却愈想跳出这一工作，因为通过他与各地青年谈话并观察中国社会实际情形，觉得中国政治腐败，社会黑暗，一般青年学生大多所学非所用，一出学校即有踏入失业队伍的危险，职业指导的效用，实在很有限。韬奋感到苦闷，感到自己的思想应该由原来的‘牛角尖’里面转出来。

1925年10月，职教社创办了一份刊物——《生活》周刊。该刊原来的宗旨只是为了迅速传布关于职业教育的消息。最初由王志莘担任主笔。一年之后，因王志莘进入银行界工作，韬奋以职教社编辑股主任的身份接任《生活》周刊主编。韬奋接受这个工作时，虽已辞去英文教员职务，但又兼任《时事新报》秘书主任，白天在报馆办事，晚上编辑《生活》周刊。这样大约过了一年光景。后因《生活》周刊发展需要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韬奋辞去《时事新报》馆的职务，全

力办《生活》周刊。从接编《生活》周刊开始 韬奋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

韬奋接手后 即确定宗旨为‘暗示人生修养 唤起服务精神 力谋社会改造’^①。此后，渐渐由偏重个人修养和职业修养转向关注政治和社会问题。从《生活》周刊第2卷第1期开始 正式开辟《读者信箱》专栏 发表读者对《生活》周刊的意见和希望。从改良主义和爱国主义出发 韬奋使《生活》的内容和主张更贴近民众 更积极向上。韬奋在《生活》上辟有《人物介绍》、《国外生活概况》等专栏 介绍苦学成功人士的传记和言行，介绍欧美、日本等国的政治、经济、生活概况，给读者树立学习的榜样和作为改良生活的参考。在给《农民运动与暴动》一文写的附语中 韬奋肯定农民运动是对‘万恶的军阀、暴虐的地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社会制裁力’，同时又强调‘法治精神’反对‘暴动’。^② 韬奋在给自己译述的《一位美国人嫁与一位中国人的自述》所加的‘译余闲谈’中 猛烈抨击‘封建大宗族主义’，实在可说是‘罪恶贯盈’，非弄他到‘呜呼哀哉尚飨’不可”提出‘提倡小家庭主义’、‘男到女家’、‘经济独立’等改良措施。^③ 韬奋明确强调，“本刊动机完全以民众的福利为前提”替民众里面最苦的部分 对于社会的呼吁。”说到全国大多数民众的利益 我们以为力求‘政治的清明’与‘实业的振兴’都是根本要策。”我们痛恶虐待职工不顾人道的惨酷资本家；而对于优待职工热心群众利益的实业家，却表同情。^④ 指出《生活》周刊是“以读者利益为中心，以社会改进为鹄的”表示要‘竭其毕生精力 奋勉淬勉 把这个小小的周刊 弄得精益

① 《我们的立场》，1930年12月13日《生活》周刊第6卷第1期。

② 1927年1月30日《生活》周刊第2卷第13期。

③ 1927年2月27日《生活》周刊第2卷第17期。

④ 《本刊与民众——本刊动机的重要说明》，1927年3月27日《生活》周刊第2卷第21期。

求精，成为社会上人人的一個好朋友，时时在那里进步的一个好朋友。”^① 由于韬奋的认真负责，由于内容的革新和为读者热情服务，《生活》周刊不到三年，每期销数便由两千多份而增至四万份。接办《生活》周刊后，因与广大读者发生联系，韬奋成为广大读者的朋友，给他们解决问题，给他们服务；但广大读者也在数万封的通信中，使韬奋了解到各种具体问题，了解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黑暗面。韬奋的思想有了巨大的进步，即逐渐自觉地跳出狭隘的个人主义的圈子而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这可由《生活》周刊前后内容的不同看出来。在韬奋接办该刊的初期，其内容只偏重于个人的修养问题，注意于职业修养的商讨，这属于教育和职业指导的范围。但随着韬奋个人思想的发展，该刊也就“渐渐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开始深入研究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了。韬奋在《经历》中说道：“也许是由于我的个性的倾向和一般读者的要求，《生活》周刊渐渐转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对于黑暗势力不免要迎面痛击。”不但如此，《生活》周刊即一天天和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系，社会的改造到了现阶段又决不能从个人主义做出发点；如和整个社会的改造脱离关系而斤斤较量个人的问题，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于是《生活》周刊应着时代的要求，渐渐注意于社会的问题和政治的问题，渐渐由个人出发点而转到集体的出发了。……《生活》周刊的新的进展也渐渐开始了。”^② 韬奋思想的进步带动了《生活》周刊的进步。

《生活周刊究竟是谁的？》，1928年11月18日《生活》周刊第4卷第1期。

② 《经历·转变》，《韬奋全集》第7卷第203页。

立足大众立场

1929年10月从《生活》周刊第5卷起，韬奋进一步改变编辑方针，以当前时事为对象，以讨论社会和政治问题为主，形式也从单张改为十六开本，销数增至八万份。面向大众，服务大众，立于大众立场的观点开始明确和坚定。《生活》周刊先后刊登英、法、美、日、德、比利时、墨西哥、意大利及南洋各国特约通讯员的专稿，反映各国社会政治问题。对贪官污吏毫不留情地进行揭露和抨击，旗帜鲜明地宣传抗日救国主张。1930年11月28日韬奋乘《生活》周刊创刊五周年纪念的机会在《我们的立场》^①一文中，比较系统的阐述了《生活》周刊当然也是韬奋自己的立场。“依最近的趋势 材料内容尤以时事为中心，希望用新闻学的眼光，为中国造成一种言论公正评述精当的周刊。”

韬奋指出：

“本刊是没有党派关系的，这并不含有轻视什么党派的意思，不过直述本刊并没有和任何党派发生关系的一件事实。我们是立于现代中国的一个平民地位，对于能爱护中国民族而肯赤心忠诚为中国民族谋幸福者，我们都抱着热诚赞助的态度。

“我们不愿唱高调，也不愿随波逐流，我们只根据理性，根据正义，根据合于现代的正确思潮，常站在社会的前一步，引着社会向着进步的路上走。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思想是与社会进步时代进步而俱进。

^① 《我们的立场》，1930年11月28日《生活》周刊第6卷第2期。

“我们希望能借本刊批评讨论各种较重要而有趣味的问题所采用的方法——含有分析的眼光，研究的态度，组织的能力，创造的思想——为中国国民养成分析、研究、组织与创造的种种能力。希望他们对于任何问题都能具有分析的眼光，研究的态度，组织的能力，创造的思想，不盲从，不武断，具是非心，有辨别力。”

“民族兴盛与社会改进是要靠多方面各就其境地能力而分工努力促成的，本刊不过是许多努力的无数单位中的一个，好像大海汪洋中的一个细流，所以本刊从来不存包办一切的态度，只想竭尽我们的绵薄，在振兴中国民族改进中国社会的许许多多努力中，希望能贡献我们一个小单位或一个细流的责任。”

“九一八”事变是韬奋和《生活》周刊在思想上发生急剧转变的转折点。“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韬奋在《生活》第6卷第40期上发表四篇《小言论》，呼吁全国人民“应彻底明了国难的真相”，以决死的精神团结起来作积极的挣扎与奋斗”。并在《本周要闻》中报道了这一事变，痛述“本周要闻”是全国一致伤心悲痛的国难，记者执笔忍痛记叙，盖不自知是血是泪！此后一段时间，《生活》周刊以抗日救国为主要内容，周刊逐渐演变成为新闻述评性质的刊物。

1932年1月9日，韬奋在《我们最近思想和态度》^①中写道：“本刊最近已成为新闻评述的周报，故有所论述，多以当前事实为对象。但于就事论事之中，亦自有其核心标准，此种核心标准，简言之，可曰‘正义’，……我们所信守的正义，是反对少数特殊阶级剥削大多数劳苦民众的不平行为；换言之，即无论何种政策与行为，必须顾到大多数民众的福利，而不得为少数人假借作特殊享用的工具。”本刊愿本此信心，就民众的立场，对政府、对社会，都以其客观的无所偏私的态度，作诚恳的批评或建议；论事论人，一以正义为依归；正义所

^① 1932年1月9日《生活》周刊第7卷第1期。

在 全力奔赴 生死不渝。”

1月中旬，国民党政府派胡宗南找韬奋谈话，就抗日问题和《生活》周刊的主张问题，辩论了四个小时。胡宗南力图施加压力，使韬奋和《生活》周刊改变立场。韬奋严正表明：“站在中国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对于暴日的武力侵略，除了抵抗之外，不能再有第二个主张”，“站在中国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站在一个认识清楚中国局势而有良心的新闻记者立场上，对于中国前途，我认为只有改变生产关系，而后可以促进生产力。舍此之外，并无第二条出路。中国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之下，决不能抬头，也没有能力达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因为他们太软弱了”。胡宗南要求韬奋“拥护”国民党政府 韬奋回答：“只拥护抗日‘政府’。不论从哪一天起 只要‘政府’公开抗日 我们便一定拥护 在‘政府’没有公开抗日之前 我们便没有办法拥护。这是民意 违反了这种民意，《生活》周刊便站不住 对于‘政府’也没有什么帮助。”^① 韬奋坚守着中国人民大众的立场，不屈服于政治威权的压力。

同年 7 月 2 日 韬奋写了《我们最近的趋向》^② 一文 强调“本刊虽未加入任何政治集团的组织，但我们却有我们自己的立场：凡遇有所评述或建议，必以劳苦民众的福利为前提，也就是以劳苦民众的立场为出发点。”认为中国“只有社会主义一条路走”要能“暂时忍耐”“重大的牺牲”。文中指出：“在中华民族独立运动的进行中，一方面因不可不注意于本国政治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同时对于反帝国主义的工作尤丝毫不容放松——尤其是对于进攻最猛侵略最急的日帝国主义者——我们认为要为中华民族求生路，这两方面有兼程并进的必要。” 韬奋在政治思想上又前进了一步。

韬奋立于大众立场 批评时政 引导舆论 且影响范围很大 遂不

毕云程：《邹韬奋先生五周年祭》，《世界知识》第 20 卷第 6 期。

② 1932 年 7 月 2 日《生活》周刊第 7 卷第 26 期。

能见容于国民党当局。在政治压力难以压韬奋屈服的情况下，禁邮和查禁的命令便接踵而至。1933年7月国民党政府以“言论反动，毁谤党国”的罪名，下令禁止《生活》周刊在河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邮递，后又禁止在全国邮寄。有的学生甚至因为购阅《生活》周刊而遭逮捕。当时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曾经两次致电当局为《生活》说情，当局两次回电都说一定要禁止邮递。后来又有人向某大员“疏通”此事，某大员拿出一厚本合订起来的《生活》周刊，上面凡是批评国民党的地方都已经用红笔划了出来，并表示：“批评政府就是反对政府，所以绝对没有商量之余地”^①。韬奋和全体同人一起，想尽各种办法冲破封锁，克服困难。对上海本市的刊物代销处和订户，派出十几个自己的人分送；外埠发行经邮局寄递虽受了禁止，也依靠着广大读者的支援把它冲破了。当时散布在铁路、轮船、航空等交通机关做事的许多《生活》周刊读者，随时随地热心地协助他们，把大捆大包的刊物运送出去。对于路途遥远的偏僻地区，他们就改头换面地用各种旧的封套邮寄，骗过“邮检”人员的眼睛。这样，《生活》周刊的销路不但未减少，反而一天天地较前增加了。本年《生活》每期发行数已达十五万五千多份。

鉴于《生活》周刊随时可能被扼杀，韬奋决定把刊物和出版机构分开，在福州路384号正式设立“生活书店”，采用合作社组织，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书店工作人员约有二、三十人^②。韬奋做好了应付变局，延续事业的准备。

10月22日，韬奋预料《生活》周刊的被封禁已不可避免，预先写好《与读者诸君告别》一文，准备随时在被封禁的最后一期上发表，重申“宁为保全人格格而决不为不义屈”的决心，“义无反顾，不欲苟全”。10月29日，在《生活》周刊第7卷第43期刊登《生活日报宣告

① 韬奋：《患难余生记》，《韬奋全集》第10卷第828页。

② 毕云程：《韬奋与生活书店》，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1辑。

停办发还股款启事》说：“近日来，《生活》周刊遭受压迫，日在挣扎奋斗之中。就目前形势言，周刊存亡，未卜朝夕。在此环境之下，日报即令勉强出版，亦难为民众喉舌。韬奋受二千余股东付托之重，不愿冒昧将事，为此决定停办。所有股款自十一月一日起，统由新华银行凭股款收据分别发还。”不能站在大众的立场上说话，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民众喉舌”，不能反映民众生活实况，不能保全“人格报格”，韬奋宁愿冒《生活》被查封的危险，宁愿停止筹划中的《生活日报》。

1933年12月16日，《生活》第8卷第50期发表韬奋一年多前写的《与读者诸君告别》一文，并发表《最后的几句话》，表示：“统治者的利剑可以断绝民众文字上的联系，而不能断绝精神意识上的联系。人类全部历史记载着，民众利益永远战胜了一切。”韬奋在伦敦知道《生活》周刊停刊后，表示深信《生活》周刊的精神是永远存在的，因为它所反映的大众的意志和努力不是一下子可以消灭的。《生活》周刊从创刊到被迫停刊，共出版了8卷（每卷50期左右）。

韬奋并不因《生活》周刊的被封而有所退却。经过对英国、法国、德国、苏联、美国等国的新闻事业的考察和研究分析，他立于大众立场的观点更加鲜明，态度更加坚定。

1935年11月16日，《大众生活》在上海创刊。《大众生活》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鲜明地提出“团结抗日，民主自由”的主张，积极推进抗日救亡运动。韬奋任《大众生活》的主编兼发行人，金仲华、柳湜等参加编辑工作。韬奋在创刊号上发表《我们的灯塔》（发刊词），宣布“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为该刊三大目标，并明确地提出了抗日联合战线的主张，号召全国人民力争开放言论自由和民众运动，一致团结抗日。他特别强调克服个人主义的必要性：“以个人的利害为中心，以个人的利润为背景，又怎能团结大众，共同奋斗来争自由，所以我们要应现代中国的大众需要，就必须克服个人主义，服膺集团主义”。这标志着韬奋已经同个人主

义彻底决裂 确立了新的世界观。《大众生活》受到读者热烈欢迎，一开始销数就是十五万份，后来达到二十万份，打破了中国杂志发行的记录。11月23日 韬奋在《大众生活》第1卷第2期的《大众信箱》栏回答读者 表示该刊将会“避免《生活》的缺点 保留《生活》的优点”并否定早期提出的“暗示人生修养”的方针 指出“现在不是由个人主义做出发点的所谓‘独善其身’的时代了，要注意怎样做大众集团中一个前进的英勇的斗士，在集团的解放中才能获得个人的解放”。1936年2月15日在《大众生活》第1卷第14期上发表《韬奋紧要附启》说：“近来得各方读者好友来信 报告本刊将被封闭和我将被拘捕或陷害的消息”，并严正声明：“我深信只有大众有伟大的力量，只有始终忠实于大众的工作才有真正的远大效果，我个人无论如何始终坚决保持这个信仰，决不投降于任何与大众势不两立的反动势力。”

1936年6月7日在《生活日报》创刊词里 韬奋指出：“本报的两大目的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这也是从民众的立场 反映全国民众在现阶段内最迫切的要求”；以全国民众的利益为一切记述评判和建议的中心标准”。6月21日，《生活日报》创刊还不到半个月，各地读者的来信，已经像雪片飞来，在编辑部的案头总是堆得有一尺多高。这些来信对《生活日报》不是提出许多意见，便是表示一些希望。韬奋为此发表《关于〈生活日报〉问题的总答复》，^①阐述了他对“理想的《生活日报》”的设想。他认为，《生活日报》“必须是反映全国大众的实际生活的报纸；必须是大众文化的最灵敏的触角；必须是五万万中国人（连国内国外的中国人合计）一天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必须成为一切生产大众的集体作品，必须由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职员、学生直接供给言论和新闻资料 而不

^① 1936年6月21日《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第3号。

是仅由少数职业投稿家和新闻记者包办一切”。韬奋明确指出：“只有在新中国才能有理想的《生活日报》”而“新中国并不是等着就会到来的，这要依靠我们全国大众共同努力创造”。

生活书店也是立足于大众立场来组织出版自己的书刊和销售其他出版单位的书刊的。生活书店仅在抗战初期，除陆续出版杂志八种，书籍近千种外，曾为一般民众编行《战时读本》及“大众读物”。前者，内容以深入浅出的写法，灌输一般民众关于抗战救国的知识，印数达百余万册；后者是宣传抗战的通俗小册子，印数共达三百余万册。这两种宣传抗战国策及建国伟业的通俗书籍，共计约五百余万册。生活书店当时所出的书籍与期刊，始终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坚持民主、反对分裂、反对投降、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完全一致，与当时的“进步主潮息息相关”，站在抗战救亡的最前线，就像“火炬”一样，照亮了人们的心扉，鼓舞了千千万万的人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之中，为抗战救国，为民主进步而努力奋斗。

贴近民众

贴近民众，让民众接受他所编辑出版的报刊和书籍，听取民众对他所编辑报刊的要求和意见，让民众在他所编辑的报刊上发表见解和看法，是韬奋立足大众立场，服务大众的一个重要方面。

韬奋担负起主编《生活》周刊的责任后 就在《本刊与民众——本刊动机的重要说明》^① 一文中明确宣示：“至于文字方面，本刊力避‘信屈聱牙’的贵族式文字 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文字。”

“本刊的动机完全以民众的福利为前提，今后仍本此旨，努力进行。而且本刊向来的态度是尽量容纳读者的意见，不但读者通信栏专为此而设，即其他文字，凡来稿之有价值，有趣味而与此旨相合者，无论意见或有异同，无不公布以作公开的讨论，今后仍本此态度，容纳民众之意见，使本刊对于民众有相当的贡献。”

倡导和采用‘平民式’的文字“容纳民众之意见”韬奋力图从语文形式上和内容上使《生活》周刊更贴近民众。

韬奋在《创办〈生活日报〉之建议》^② 中讲到《生活日报》的特色“特别注意：(1)农工疾苦；(2)妇女运动；(3)青年修养；(4)华侨状况；(5)为大众多数民众谋福利之经济建设及教育建设。”语言上要“用最浅显之文笔 描写复杂之事实 凡深僻之字句及古典 均力求避免”。

发表在《生活日报》创刊号和第2号的《编者的话》^③ 中韬奋写

① 1927年3月27日《生活》周刊第2卷第21期。

② 1932年3月5日《生活》周刊第7卷第9期。

③ 1936年6月7日、8日《生活日报》创刊号和第2号。

道：“我们除了凭着自己的一片热诚与勇气之外，更希望全国广大的读者加以切实的帮助。”

韬奋希望读者大众帮助的是下列三点：

尽量供给报纸以改进意见；

尽量供给报纸以有用的稿件；

尽量使报纸扩大读者的范围。

韬奋理想中的《生活日报》应该是反应全国大众的实际生活的报纸；是大众文化最灵敏的触角；是五万万中国人一天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①

韬奋强调报纸应该成为发表一切生产大众集体作品的园地，应该由全国各地的工人 农民 职员 学生直接供给言论和新闻资料 报纸的内容，应该记载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各地大众的生活活动和希望与要求。报纸所登载的消息，决不是要人往来，标金涨落等等，而是和人民大众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一切新闻事实。

在《我们要怎样办〈生活日报〉？》^②一文中 韬奋强调《生活日报》内容应该大众化，文字应该平民化。

“因为《生活日报》是以最大多数老百姓为背景 所以它的内容应该办求大众化，应该极力接近大众，使大众看得懂这个报；使大众感觉到这个报对于他们的知识，经验，以及一切日常的生活，都有益处；使大众感觉到这个报是他们的生活里不能离开的一件东西。”韬奋进一步指出，“这不是一个空洞的幻想，要竭力在报的内容里努力实现出来。”

韬奋希望《生活日报》能成为使用平民化文字的榜样，“《生活日报》的文字要力求大众化。我们要尽可能用语体文字来写一切文字。

^① 《关于〈生活日报〉问题的总答复》，1936年6月21日《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第3号。

^② 1936年8月23日《生活星期刊》第1卷第12号。

在现在，完全用语体文来写的日报还是没有，我们希望〈生活日报〉能做一个榜样。”

韬奋给受教育不多的普通贫苦大众以特殊的关心：“我们要竭力注意文化落后的大众 至少每天《生活日报》的一部分 要使一切初识字半通文的孩子们 农夫们 工友们 妇女们 都能够看得懂。我们并且欢迎这些文化落后的同胞们写通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大众的生活反映到报纸上面来。只有这样，《生活日报》才是大多数人的报纸，而不是少数人的报纸。” 韬奋把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贫苦民众接受《生活日报》 能够读懂《生活日报》的一些内容 积极给报纸撰写反映他们生活状况的文章，作为《生活日报》成为真正大众报纸的一个标志。

正是从贴近民众的指导思想出发，韬奋领导的生活书店在出版工作中把普及与提高结合起来而把普及工作放在首位。一方面出版比较专门的学术著作，以满足少数文化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的需要，如出版‘世界文库’、‘世界学术名著译丛’、‘百科小译丛’、‘世界知识丛刊’、‘学习与研究丛刊’、‘中国经济论文集’等等 而更大量的是努力出版供文化水平不高的工农大众和青年学生阅读的书刊。其中有以青少年读者为对象的‘青年自学丛书’、‘新知识初步丛刊’、‘少年文库’等；有直接配合抗战形势，以广大军民为对象的大量抗战文化书刊 著名的有‘救亡文丛’、‘黑白丛书’、‘抗战中的中国丛刊’、‘战时通俗读物’、‘战时教育丛书’、‘战时大众知识丛刊’等。为了及时回答前后方军民对国内外时事提出的问题，生活书店还特地出版了一种‘问题与答案丛刊’ 由韬奋、金仲华、艾寒松、张仲实组成编委会，以每个月六册的速度出版。为了让文化水平低的军民看得懂，对于已经比较通俗的刊物《全民抗战》还尽力再加以通俗化 另出‘战地版’、‘通俗版’。这些做法 在中国出版史上确是创举 它反映了韬奋领导的生活书店对于供应大众精神食粮的高度重视和实际努力。